

农村土地经营权融资：农民认知与参与意愿

安海燕^{a,b}, 黄大佳^a

(贵州大学 a.经济学院; b.中国喀斯特地区乡村振兴研究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基于认知理论和全国农地融资试点地区 852 份入户问卷数据, 运用 Logit 模型探讨农民土地经营权融资认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 结果表明: 大量农民认知滞后于制度的变化, 有 39% 的农民处于认知协调 (其中 36.66% 为无偏差认知协调、2.34% 为偏差认知协调), 22% 的农民处于认知失调, 39% 的农民处于认知无关状态。与认知无关组相比, 无偏差认知协调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参与意愿, 认知失调则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参与意愿。由此可知, 农民相关联多场景认知体系越协调, 越能及时跟进制度的调整, 就越倾向于利用新制度。

关键词: 农村土地; 经营权融资; 农民认知; 参与意愿

中图分类号: F832.43; F3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9)02-0008-08

Financing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 Farmers' cognition and participate willingness

AN Haiyan^{a,b}, HUANG Dajia^a

(a.School of Economics; b.Research Institut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Karst Region of China,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gnitive theory and the questionnaire data of 852 in the pilot area of agricultural land financing in the country, the Logit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rmers' land management rights financing cognition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large number of farmers' perceptions lagged behind the changes in the system, with 39% of farmers in cognitive coordination (36.66% of them were in unbiased cognitive coordination, 2.34% in biased cognitive coordination), 22% of farmers in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39% of farmers in the cognitive-independent state. Compared with cognitive-independent, unbiased cognitive coordinatio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affecte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ffected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ore coordinated the farmer's multi-scenario cognition system is, the more likely they would follow the adjustment of the system in a timely manner, and more inclined to use the new system.

Keywords: r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financing; peasant cognition;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土地经营权融资 (以下简称“农地融资”) 是我国农地“三权分置”下的一项制度创新^[1], 现已正式成为我国农民获取金融资金的合法途径。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7条明确规定“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

也再次强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担保融资”。从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经验来看, 只有契合农民需求、被农民认知并接受的制度才是真正意义上成功的制度^[2]。农地融资从2009年试点运行至今已10年, 经历了全面禁止、法律禁止制度允许、全面允许的制度变迁, 那么农民认知是否随之调适, 对农地融资制度会产生怎样的响应? 该问题的探究, 对我国农地融资的全面实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学者近年对农民参与农地融资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开展了广泛的探讨。牛晓冬、许泉、肖轶等^[3-5]调查研究发现, 各地农民的参与意愿有着较大的差异性, 陕西省1192户农民中有71%的不愿意参与, 江苏省的910户农民中有57.5%不愿意参与, 重庆市

收稿日期: 2019-03-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JY040);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GZYB41); 贵州大学贵州省农林经济管理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项目(GNYL[2017]002)

作者简介: 安海燕(1979—), 女, 贵州铜仁人, 博士, 贵州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1141 户农民中有 38.4% 不愿意参与。肖轶、刘婷婷、曾庆芬等^[5-9]研究表明，个体特征、家庭禀赋、外部金融供给、抵押贷款利率等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民农地融资的参与意愿。随着行为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认知作为影响个体行为、衡量制度绩效的关键要素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洪名勇、罗必良、彭长生等^[10-13]研究了农地产权认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农地法律认知对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农地安全认知对宅基地流转的影响，等等。杨婷怡、惠献波、牛荣等^[8,14-21]将认知作为要素之一，选择知晓程度、可否抵押贷款、满意程度量化认知，探讨农地融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农民认知显著影响参与意愿，即认知程度越高，则农民的参与意愿越高；另一种观点是认知不会对农民农地融资意愿产生影响。

文献梳理表明，认知作为连接制度与主体行为的关键要素值得深入研究，但农民认知对农地融资影响的既有研究仍有其局限性，特别是测度农民认知的方法较单一，不能体现出农地融资“禁止—试点—全面允许”制度调整的动态性，也无法反映农民认知的复杂性。从行为逻辑上来说，农地融资是一项关乎农民“命根子”的制度改革，农民参与意愿及其行为涉及农民认知体系的更新与调整，是经过深思后的结果，不能简单用“知道与否”“满意程度”来衡量。此外，农民的认知不仅与国家宏观制度有关，还受各地农地融资制度实施模式的影响。鉴此，笔者拟借鉴认知理论，选择能反映认知动态性的认知指标，结合农地融资制度实施模式，基于全国多个试点地区的调查数据，探讨农民认知对农地融资参与意愿的影响。

二、研究视角与模型构建

1. 研究视角

近年来，认知被纳入行为与制度分析的框架中，并逐渐成为解释行为决策、制度变迁的重要构件。在认知内涵研究中，哈耶克^[22]将认知定义为一种心智，属于自然秩序体系中的“感觉秩序”，是将“新感觉素材，同我们既有的知识记忆相联结，形成感觉体验的互联网络”。North^[23]认为认知是一种心智模式，“表现为个人的信念结构”，是“解释环境的内部表现”。青木昌彦^[24]指出个体的认知是

“有限的主观认知”，由于“个体不可能具备关于博弈规则的完备知识，也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策略决策和状态做出完备的推断”，因此“个人的认知是有限主观认知”且“有限主观认知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者认知出现内部危机的时候才会被修改”。个体认知的“变动性”“不完全性”使得学者形成了多样的认知衡量方法。哈耶克^[22]将认知按照过程分成“新感觉素材”“既有知识”“联结”三个环节；卡尼曼、Kahneman、费斯汀格等^[25-30]关注个体主观有限认知中的认知偏差与认知失调，认为由于信息与个体理性的不完全，认知偏差与认知失调是人类认知中的必然，也是决策不可避免的结果。当个体认知与强制规定的法律、制度、习俗不吻合时，属于认知偏差。认知是互联网络，多场景认知会形成一个认知体系；单场景认知会出现偏差，这使得认知体系会出现不同的状态。费斯汀格^[27]指出，两种认知在联结形成体系时，会出现三种状态，认知无关、认知失调和认知协调。认知无关是一个认知元素对另一个认知元素没有什么意义；认知失调是一个元素紧跟着另一个元素的反面，那么这两个元素就处于失调的关系。逻辑上的不一致、文化上的习俗、观点的普遍性是造成认知失调的主要原因。当人们体验到两种认知之间的不一致，会激发努力改变这种状态的动力，最终形成自我的认知一致。

借鉴费斯汀格的认知状态与哈耶克的认知过程，结合农地融资的特征，本研究对农民农地融资认知进行界定。农地融资从本质上来说分属两个场景：一是产权场景，即农地经营权的权属场景；另一个属于金融场景，即农地经营权融资可行性场景。当两个场景在农民认知体系中进行联结时，依据“权属与行为对等”原则，就会形成不同个体认知状态。借鉴朱宪辰等^[31]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构建土地经营权归属与经营权融资行为的复合场景，按照“权属与行为对等”原则进行农民认知衡量。

(1) 产权场景。产权场景是农民认知经营权归属性的场景，即农民对农地经营权归属的认知判别。《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农村承包地经营权归农民所有。但在现实中，农民的权属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认为经营权归属国家、集体等非农民的其他

主体。已有文献表明,农民产权多主体性认知具有长期持续性^[32]。造成此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一直存在着界定、变迁的模糊性^[33],法律歧视造成的公共领域以及主体形成的公共领域^[34],识别成本的存在以及当事人识别能力的有限性,多元规则如法律规则、市场规则、宗祖规则、地方规则等^[35]。本研究关注农村土地经营权归属认知,以“你认为土地经营权归谁所有”测量该场景,依据作答分成“自己”“非自己(国家、集体)”“不清楚”三维度。将回答“自己”视为无偏差产权认知,其他视为偏差产权认知。

(2) 金融场景。金融场景是农民认知农地经营权可否融资的场景,即农民对农地经营权融资可行性的认知判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与相关制度明文规定,农地经营权可以融资。由于农地融资在制度上经历了“禁止—试点—全面允许”三个阶段,若农民的认知并未随制度发生调整,依旧停留在“禁止”或者“试点”阶段,就可能形成“农地经营权不可以融资”的偏差性认知。基于此,本研究用“你认为土地经营权可否融资”问项测量该场景,将回答“可以融资”视为无偏差金融认知,其他视为偏差金融认知。

(3) 场景复合。借鉴费斯汀格、朱宪辰等的研究,依据“权属与行为对等”原则,构建产权场景与金融场景的复合场景(表 1),以此衡量农民的农地融资认知。

表 1 农民认知状态构成表

		行为场景 V ₂		
		可以	不可以	不清楚
权属场景 V ₁	自己	W ₁	W ₂	W ₃
	非自己	W ₂	W ₁	W ₃
	不清楚	W ₃	W ₃	W ₃

复合场景认知由单场景认知(V₁、V₂)构成,形成九个象限、三种认知状态(权属与行为对等的W₁认知协调、权属与行为不对等的W₂认知失调、权属与行为无关的W₃认知无关)。W₁认知协调表示农民在两个场景认知具有逻辑一致性,即“有权有行”“无权无行”。结合农地融资规定,我们认定“土地经营权是农民自己的,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有权有行)”是无偏差下的认知协调,“土地经营权不是农民自己的,不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无权无行)”是偏差下的认知协调。W₂是认知失调状态,

存在“有权无行”和“无权有行”的两类认知。W₃是认知无关状态,表明农民两种场景认知无法建立联结,农民要么建立其中一种认知,要么两种场景认知均未建立。

各区域差异性的农地融资制度实施模式可能是造成农民认知差异的主要原因。我国农地融资制度实施模式按照推动方的不同可分成供给推动型模式和需求推动型模式^[36],不同模式下的信息通道与传递方式不同,则会影响农民的认知情况,进而形成不同的认知状态。两种模式下的农民认知过程如下图 1、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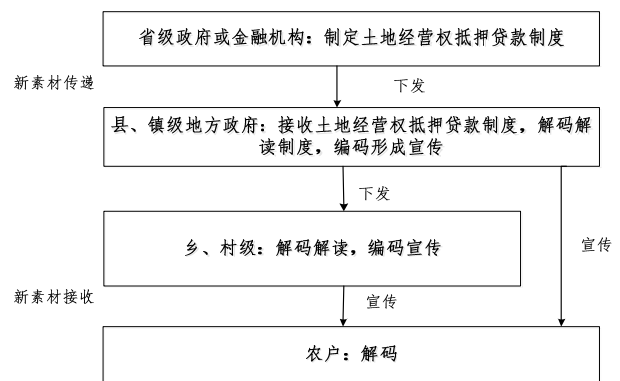


图 1 供给推动型模式下的农民认知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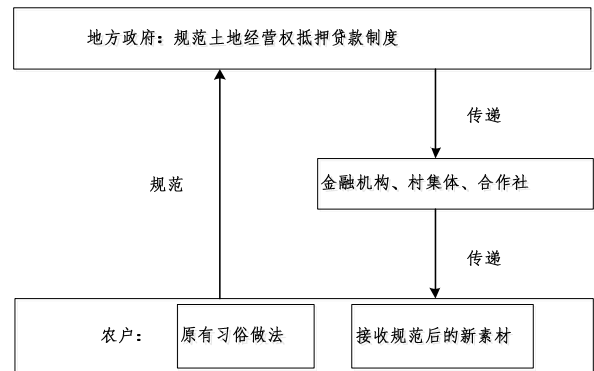


图 2 需求推动型模式下的农民认知过程

供给推动型模式下(图 1),供方(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制定农地融资制度,从上至下逐层传递,经过最少两次解码最终传递到农民层面。需求推动型模式下(图 2),需求方农民依据习俗利用农地融资,地方政府将其规范形成正式制度,并将规范后的制度向下传递给农民。可见,相对于供给推动型模式,需求推动型模式下农民的认知环节少(解码、编码次数少)认知基础好(制度基于农民习俗做法而来)。

2. 模型选择及变量说明

本研究关注农民认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农民

参与意愿用“愿意=1”“不愿意=0”二维度表示，故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设定农民参与农地融资 $y_i=1$ 的概率如下：

$$P=(y_i=1)=P(y_i > 0)=P(u' > -x_i B) \quad (1)$$

将 u' 进行概率分布推导，得到具体的函数表达式：

$$p=F(\alpha+\sum\beta_i x_i)=1/(\exp[-(\alpha+\sum\beta_i x_i)]) \quad (2)$$

根据 (2) 式，得到：

$$\ln p_i/(1-p_i)=\alpha+\sum\beta_i x_i \quad (3)$$

式中， p 表示农民参与农地融资的概率， x_i 是影响第 i 个农民参与意愿的因素， α 为模型的回归截距， β_i 为第 i 个因素的回归系数。核心变量认知状态分成认知协调、认知失调以及认知无关三维度。认知协调又由无偏差认知协调与偏差认知协调构成，两类不同的认知协调需进行区别对待。因此建立三个回归模型，模型 1 是认知协调中只包含无偏差认知协调，模型 2 是认知协调中只包含偏差认知协调，模型 3 是全样本。将函数进行整理，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P(y_i)=\alpha+\beta_1 x_{i1-1}+\beta_2 x_{i2}+\beta_3 x_{i3}+\beta_4 x_{iz}+\zeta_i \quad (4)$$

$$P(y_i)=\alpha+\beta_1 x_{i1-2}+\beta_2 x_{i2}+\beta_3 x_{i3}+\beta_4 x_{iz}+\zeta_i \quad (5)$$

$$P(y_i)=\alpha+\beta_1 x_{i1}+\beta_2 x_{i2}+\beta_3 x_{i3}+\beta_4 x_{iz}+\zeta_i \quad (6)$$

其中 x_{i1} 是农民认知协调变量， x_{i1-1} 是无偏差认知协调变量、 x_{i1-2} 是偏差认知协调变量， x_{i2} 是认知失调变量， x_{i3} 是认知无关变量， x_{iz} 为其他影响变量， ζ_i 为服从逻辑分布的误差项。

依据上文分析，农民在产权场景与金融场景认知联结时，遵循“权属与行为对等”原则的视为认知协调，即 $X_1=1$ ，反之 $X_1=0$ 。其中，当农民处于“土地经营权是自己的且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时，无偏差认知协调变量 $X_{1-1}=1$ 反之 $X_{1-1}=0$ ；当农民处于“土地经营权不是自己的，且不可向金融机构融资”时，偏差认知协调变量 $X_{1-2}=1$ 反之 $X_{1-2}=0$ 。当农民在联结产权和金融场景认知时，出现“权属与行为不对等”，具体包括“土地经营权是自己的，但不可融资”“土地经营权不是自己的，但可以融资”两种认知时，认知失调变量 $X_2=1$ ，反之 $X_2=0$ 。当农民两个场景认知未产生联结时，视为认知无关，具体包括单场景或双场景认知表示不清楚时，认知无关变量 $X_3=1$ ，反之 $X_3=0$ 。

已有文献表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借贷情况等均影响农民的参与意愿^[5-9,14,20]。参考已有文

献，本研究选择以下控制变量。个人特征选择受教育程度与年龄；家庭特征选择经营的土地面积与家庭类型，土地面积包括自有的和流转的，家庭类型借鉴汤谨铭等^[37]的衡量方法，分成纯农户、非农户与兼业户，其中纯农户是家庭所有劳动力都从事农业，非农户指所有劳动力都从事非农业，兼业户处于两者之间；区域情况选择样本所属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和家庭离行政、市场、金融机构的平均综合距离；借贷情况选取农民是否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过、融资贷款实际利率两个变量。

三、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不久，较难在短时期内获得全国数据。国家于 2013 年允许试点地区实施农地融资，连续多年一号文件、相关制度尤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 232 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 59 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均明确表达，试点地区农地融资具有制度可行性。因此，本研究拟选择试点地区为调研对象，数据获取时间是 2014—2017 年。调研数据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农地融资重点调研区，由贵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教师、研究生调研完成，选择较早开展农地融资、效果已凸显的试点地区。最终选择贵州凤冈县、嘉兴南湖区、宁夏同心县和重庆江津区。另一部分是农地融资广泛调研区，由贵州大学相关专业本科生调研完成，调研地为除重点调研地外，只要开展农地融资的地区即可。农民农地融资意愿是建立在有资金需求的基础上，若不剔除无资金需求农民数据，必定会弱化意愿，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因此，本研究将研究群体锁定为“农地融资实施地区”且“有资金需求”的农民。调查共发放问卷 2300 份，回收 2185 份，剔除关键问题缺失、关键问题明显错误、重复作答等问卷，有效问卷为 1953 份，问卷回收率为 95%，有效样本率为 84.9%。对有效问卷做进一步资金需求筛选，1953 户中有 852 户具有资金需求，资金需求率为 43.6%。从调研地区来看，总样本覆盖 13 个省，其中重点调研区样本占比 52.3%，贵州凤冈县、嘉兴南湖区、宁夏同心县、重庆江津区样本分别占重点区样本数的 28.6%、10.3%、39.8%和

21.3%。从年龄来看,被调研对象平均年龄是 47.95 岁,最小为 23 岁,最大 84 岁;从土地流转情况来看,有 29.50%的农民家庭有土地流转,该数据比 2014 年北京大学 CFPS 16.35%的流转率高,说明农地融资实施地区的土地市场活跃程度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1) 产权、金融场景认知。利用统计数据,分别对农民产权、金融场景的认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土地权属认知具有多元性(表 2)。

表 2 农民产权场景认知统计结果

产权类别	产权场景认知				产权认知偏差	
	国家的	集体的	自己的	不清楚	有偏差	无偏差
经营权	2.20	4.70	87.10	6.00	12.90	87.10
承包权	2.90	6.20	83.80	7.10	16.20	83.80
所有权	50.00	15.40	26.50	8.10	84.60	15.40

在经营权归属认知中,认为是国家的、集体的分别占 2.20%、4.70%,有 6%的农民表示不清楚;有 87.10%的农民能准确表明土地经营权是属于自己的,是无偏差认知。相比较所有权与承包权,农民经营权归属认知偏差最小,这可能与国家推动经营权流转、经营权确权等措施相关,农民经营权的实际利用越高,则认知就越正确。

从全样本来,有 37.65%的农民认为经营权可以融资,24.78%认为不可以,37.57%的农民选择不清楚,共有 62.35%的农民出现了金融场景的认知偏差。从样本地来看,贵州凤冈县、嘉兴南湖区、宁夏同心县、重庆江津区分别有 90.5%、53.3%、34.1%、79.3%的农民处于金融场景认知偏差状态(表 3)。本研究的偏差结论略小于其他学者的调研结果^[16,18,19],这可能与调研区域的选择有关。

表 3 农民金融场景认知统计结果

区域	金融场景认知			金融认知偏差
	可以	不可以	不清楚	
全样本	37.65	24.78	37.57	62.35
贵州凤冈县	9.50	33.80	56.70	90.50
嘉兴南湖区	46.70	48.90	4.40	53.30
宁夏同心县	65.90	7.20	26.90	34.10
重庆江津区	20.70	24.4	54.90	79.30

(2) 复合场景认知。数据统计显示,有 39%农民处于认知协调状态,22%处于认知不协调,39%的农民处于认知无关状态。具体而言,有 36.66%的农民处于无偏差下的认知协调,2.34%的农民处于偏差状态下的认知协调。有 21.35%的农民认为土地经营权是自己的但是却不可以融资,有 0.65%的农民认为农地经营权不是自己的,但可以融资。对农民复合场景认知进行分区域分析,结果表明,认知

协调最高的是宁夏同心县,有 70.0%的农民处于认知协调状态,高于贵州凤冈县 57.6 个百分点;认知失调最严重的是浙江嘉兴,有 51.0%的农民处于该状态;认知无关占比最大的是重庆江津,有 63.6%的农民处于该状态,高出浙江嘉兴 60.6 个百分点,可见农民认知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对认知协调进行分析,贵州凤冈县、浙江嘉兴区、宁夏同心县、重庆江津区分别有 8%、45.9%、69.0%、30%的农民处于无偏差下的认知协调,4.4%、0.1%、1%、0.4%的农民处于偏差下的认知协调。可见,认知协调下的农民多数处于无偏差的认知协调状态。

四个重点调研区中,贵州凤冈县与浙江嘉兴的农地融资是典型的供给推动型模式,宁夏同心县、重庆江津区是需求推动型模式。从认知效果来看,供给推动型模式下,有 29.2%的农民处于认知协调、42.1%处于认知失调、29.6%处于认知无关。需求推动型模式下,分别有 50.2%、6.3%、43.5%的农民处于认知协调、失调与无关状态。从具体实施来看,贵州凤冈县从 2009 年实施到 2014 年截止,共放贷 3 亿元,涉及 12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嘉兴南湖区从 2011 年实施到 2014 年截止,共放贷 1001 万元,涉及 20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宁夏同心县从 2009 年截至 2015 年,共放贷 15.9 亿元,覆盖 75442 户农民;重庆江津区从 2012 年到 2015 年,共放贷 8131.64 万元,覆盖 673 户农民。可见供给推动型模式下受益对象多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推动型模式下多为普通农民,不同模式覆盖群体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的认知情况。

(3) 其他变量统计。从全样本来,有 59%的农民愿意参与农地融资,分组来看,无偏差认知协调组的贷款意愿均值为 0.58,高于有偏差认知协

调组近 18 个百分点。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2.71，介于小学与初中之间。有 68% 的农民表示曾向金融机构借贷过，其中无偏差认知协调组的借贷经历要

高于有偏差认知协调组，贷款利率平均为 8.25%。其他具体变量统计见表 4。

表 4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	变量定义及赋值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Y	参与意愿	不愿意=0, 愿意=1	0.58	0.49	0.40	0.49	0.59	0.49
X_{1-1}	无偏差认知协调	否=0, 是=1	0.37	0.48				
X_{1-2}	偏差认知协调	否=0, 是=1			0.02	0.21		
X_1	认知协调	否=0, 是=1					0.39	0.48
X_2	认知失调	否=0, 是=1	0.23	0.42	0.38	0.48	0.22	0.42
X_3	认知无关	否=0, 是=1	0.40	0.49	0.60	0.49	0.39	0.49
X_4	教育	未读书=1, 小学=2, 初中=3, 高中=4, 高中以上=5	2.71	0.96	2.72	0.96	2.71	0.97
	年龄	岁	47.18	10.58	48.16	10.45	47.95	10.45
	土地面积	亩	3.92	3.18	3.91	3.18	3.91	3.16
	家庭类型	纯农户=1, 兼业户=2, 非农户=3	1.80	0.63	1.78	0.65	1.79	0.63
	综合距离	公里	20.91	12.36	22.43	15.37	21.41	13.44
	是否借贷	否=0, 是=1	0.68	0.47	0.58	0.49	0.68	0.47
	贷款利率	%	8.24	1.49	8.33	1.56	8.25	1.50
	东部=1	否=0, 是=1	0.23	0.31	0.34	0.13	0.25	0.15
	中部=2	否=0, 是=1	0.20	0.32	0.22	0.30	0.21	0.25
	西部=3	否=0, 是=1	0.57	0.42	0.44	0.21	0.54	0.31
样本数 N			835		536		852	

四、计量结果分析

依据计量模型，运用 Stata13.0 软件进行 Logit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三个模型回归 χ^2 对应的显著性水平都为 0.00，Pseudo R^2 分别为 0.247、0.173 和 0.214，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所选变量能较好地解释农民参与意愿。

第一，认知协调对农民参与意愿的影响。以认知无关组为参照组，从全样本来看（模型 3），认知协调在 1% 置信区间内对农民参与农地融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农民认知越协调，越倾向对农地融资政策的利用。从认知协调的分模型来看（模型 1 和模型 2），出现了差异性的结论。模型 1 显示，无偏差认知协调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参与意愿，且影响强度高于全样本。该结论表明，相比较认知无关组，无偏差认知协调下的农民，具有更高的农地融资参与意愿。调研中也发现，该类农民有着强烈的农地融资意愿，他们表示“农民向银行贷款不容易，现在土地经营权可以抵押贷款了，是好事，我当然愿意了，比借高利贷好多了”“别的地方已经在实施了，如果我要贷款，我也会用土地抵押去贷的”

“政策都规定了，肯定没问题，我要急用钱，就用土地抵押贷款”。模型 2 显示，偏差认知协调对农民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相比较认知无关组而言，拥有“土地经营权不是我的，且不可以融资”认知的农民，其贷款意愿相对较低。该类农民是产权场景与金融场景同时出现认知偏差，双场景的认知偏差制约了其参与意愿。调研中该类农民普遍表示“土地又不是我的，银行又不准土地抵押，我就算想又有什么用呢？”“土地是国家的，我不敢拿去抵押”。

第二，认知失调对农民参与意愿的影响。认知失调在三个模型中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民的参与意愿，与认知无关组相比较，认知失调组农民的参与意愿更低。在调研中该类农民也表示“我自己也没搞清楚，所以不太敢去抵押贷款”“我自己也觉得说不通，所以先等别人做了再说吧”“我都跟不上时代了，反正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土地去贷款的”。可见，农民在认知失调时，往往会选择不行动或持保守观望的态度。

第三，控制变量对农民参与意愿的影响。三个模型中，年龄、是否借贷、贷款利率、地理位置显

著影响农民的参与意愿,即越年轻、越具有以往借贷经历的农民,在低利率的情况下越容易参与农地融资。地理位置方面,相对于西部而言,东部农民的农地融资意愿更低。其主要原因是东部经济条件较好,农民的借贷渠道更多,农地融资的需求要低一些。调研中东部农民表示“土地抵押最多能贷到

两三万,我直接向亲戚朋友借还方便些”。此外,土地面积与家庭类型在模型1与模型3中产生显著影响,在模型2中不产生显著影响,即在有影响的两个模型中,土地面积越小、农民的非农占比越小,参与融资的意愿越高。

表5 回归分析结果

类型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X_1	无偏差认知协调	2.23***	0.35				
	偏差认知协调			-0.68	0.70		
X_2	认知失调					1.77***	0.31
X_3	认知无关						
X_2	教育	0.16	0.14	0.17	0.15	0.16	0.13
	年龄	-0.02**	0.01	-0.03**	0.01	-0.03*	0.1
	土地面积	-0.10**	0.04	-0.05	0.04	-0.05*	0.02
	家庭类型	-0.38*	0.21	-0.34	0.22	-0.21**	0.12
	综合距离	0.02*	0.10	0.01	0.01	0.01	0.01
	是否借贷	0.37**	0.17	0.28*	0.18	0.41**	0.16
	贷款利率	-0.22**	0.09	-0.31***	0.12	-0.21**	0.09
	东部	-0.77***	0.22	-1.14**	0.39	-0.75***	0.22
	中部	-0.31	0.21	-0.06	2.36	-0.38	0.21
	$LR\chi^2$	118.1		78.3		105.9	
Prob> χ^2	0.000		0.000		0.00		
Pseudo R^2	0.247		0.173		0.214		
Log likelihood	-180.31		-145.46		-194.67		

注: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五、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农地融资在我国刚合法化,农民对其认知存在异质性与不完整性。对此关注,不仅能透视农民对该项改革的反应,也能为后期农地融资的推动提供一定的现实参考。借鉴认知理论,将与农地融资相关的产权认知与金融认知进行联结,形成协调、失调、无关的三种农民认知状态,基于全国多个农地融资试点地区有融资需求农民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39%的农民处于认知协调状态(36.66%无偏差认知协调,2.34%偏差认知协调),22%的农民处于认知失调状态,39%的农民处于认知无关状态。可见,现阶段农民出现了多元的认知状态,大量农民认知滞后于制度的变化。运用计量模型,探究农民农地融资认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认知无关组,无偏差认知协调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参与意愿,认知失调则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参与意愿。进而言之,农民相关联多场景认知体系越协调,

越能及时跟进制度的调整,就越倾向于利用新制度。上述研究对于我国全面推动农地融资的实施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应重视农民认知,提高制度效率。农地融资已实施多年,在融资市场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重视农民对农地融资的认知,以此提高农地制度效率。现阶段,地方政府多通过刺激供给推动农地融资发展,如设置国有担保、增加金融供给、建设交易市场、降低贷款成本,供给推动在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应同时调节农地融资的供给与需求,改善农民的认知结构,才能更有效实现改革目标。本研究表明,农民是异质性的个体,其行为决策受到个人认知状态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完善、推行农地融资政策时,应重点并及时关注农民的认知情况。

第二,应加强农地融资宣传,减少农民认知偏差。本研究表明,大量农民存在认知偏差,偏差下

的认知协调会降低农民的参与意愿，可见减少农民认知偏差是提高制度效率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应加强正规渠道的宣传。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可通过印制融资贷款知识手册、电视广播节目宣传、村集体开会等方式向农民进行农地融资可行性范围、实施条件、可能风险、操作流程等内容的宣传。地方政府应重视村部作用，发挥村部在农民咨询、信息传递、认知纠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应发挥农民的“示范性”。农村是熟人社会，地方政府可发挥获贷农民的示范性作用积极推广农地融资，减少农民“土地经营权不可融资”“土地经营权不是自己”的认知偏差。

第三，应加强土地产权、金融等相关知识普及，协调农民认知。农地融资认知是多场景的复合认知，要求农民拥有系统一致性的知识体系。地方政府应加强农民土地、金融等相关知识的普及，协调农民的认知体系。此外，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考虑相关领域的协调性，形成机制的联动性。只有增强农民自身认知协调与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创新的制度才能被农民所认可与采纳。

第四，应选择合适的农地融资制度实施模式，提高农民认知协调度。各地在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前提下，可借鉴以宁夏同心县为代表的需求推动型农地融资制度实施模式，提高农民认知协调度。各地方政府在实施农地融资制度时，应减少制度到农民的传递环节，避免环节过多编码与解码造成认知偏差与失调；应以农民原始认知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的规范，避免制度与原始制度差异太大造成的认知失调；制度实施应覆盖全体农民，随着身边农民获贷比例增加，农民会逐渐协调自己的认知，进而提高融资贷款的意愿。

参考文献：

- [1] 汪险生，郭忠兴．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两权分离及运行机理——基于对江苏新沂市与宁夏同心县的考察[J]．经济学家，2014(4)：49-60．
- [2] 何·皮特．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3] 牛晓冬，罗剑朝，牛晓琴．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意愿分析——基于陕西南夏农户调查数据验证[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9)：101-112．
- [4] 许泉，黄惠春，祁艳．农地抵押风险与农户抵押贷款需求——以江苏试点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6(12)：95-104．
- [5] 肖轶，魏朝富，尹珂．农户农村“三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 22 个县(区)1141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2(9)：88-96．
- [6] 刘婷婷，刘钟钦，吴东立，等．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237 个样本农户的调查[J]．农村经济，2013(2)：38-41．
- [7] 曾庆芬．产权改革背景下农村居民产权抵押融资意愿的实证研究——以成都“试验区”为个案[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11)：63-68．
- [8] 杨婷怡，罗剑朝．农户参与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陕西高陵县和宁夏同心县 919 个样本农户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4(4)：51-54．
- [9] 钱文荣，安海燕．利率对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7(3)：132-143．
- [10] 洪名勇，尚名扬．地权认知、资源禀赋、信任与农地流转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5，31(26)：274-278．
- [11] 罗必良，汪沙，李尚蒲．交易费用、农户认知与农地流转——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2(1)：11-21．
- [12] 彭长生．农民宅基地产权认知状况对其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安徽省 6 个县 1413 户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3(1)：21-33，90-91．
- [13] 钱龙，钱文荣，郑思宁．市民化能力、法律认知与农村宅基地流转——基于温州试验区的调查与实证[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5)：59-68，111-112．
- [14] 惠献波．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潜在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四个试点县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2)：9-15．
- [15] 牛荣，张珩，罗剑朝．产权抵押贷款下的农户信贷约束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6(1)：76-83．
- [16] 陈永桃，陈英，马婷婷．农民土地产权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2)：25-31．
- [17] 王凯，张文秀，黄友财．农户的农地产权认知调查结果分析——以成都城乡统筹试验区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0(5)：46-50．
- [18] 徐美银，钱忠好．土地产权制度：农民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兴化市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4-21．
- [19] 彭艳玲，孔荣．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流动性约束与农户差异性创业选择研究——基于陕甘豫鲁 1465 份入户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6(5)：50-59．
- [20] 曹璨，罗剑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供给效果评估——基于农户收入差距的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14-122．

(下转第 30 页)